

十月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构建

刘富胜

(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67)

摘 要:十月革命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澄清唯心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对十月革命的错误解读,对于补好理想信念的精神之钙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学习和借鉴十月革命的宝贵经验、坚持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坚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初心的核心意蕴。

关键词:十月革命;世界意义;中国共产党;初心构建

中图分类号:D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7)04-0012-05

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指出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如何理解和坚守党的初心,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一日不实现,初心就一日不可忘”^[1];还有学者认为,党的初心具有“历史性、人民性和科学性”,是党根据历史发展和人民利益作出的科学选择^[2]。在我们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构建与十月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具有深切关联。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念和初心在十月革命精神感召下萌发,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并逐渐完善。只有从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及其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迪出发,才能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初心的科学内涵,才能为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守精神高地提供观点方法指引。

一、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有人认为,十月革命的客观条件并不充分,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有人认为十月革命导致了俄罗斯帝国的“崩溃”,是失败的革命^[3];还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人的革命,俄国人才拥有十月革命相关话题的发言权,中国人没有必要比俄国人更积极地纪念十月革命。这些观点都没有把十月革命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没有看到十月革命对于人类社会、对于中华民族的重大意

义。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劳动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成为可能。十月革命后逐渐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仅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吸引力,而且也对资本主义从个人垄断走向国家垄断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们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更不意味着背弃十月革命的理想信念。

首先,十月革命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异化”“商品拜物教”等范畴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非人性”,通过“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等思想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从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了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我们不仅要道德伦理的角度同情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更应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看到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地位和使命。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国家“一下子”同时行动,就能带动整个世界向共产主义转变。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变化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更容易在落后国家而非发达国家爆发。在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垄断资产阶级的国际空间受到压制,只能通过加重对本国其他阶级的剥削来维持自身存在,这必

收稿日期:2017-07-02

基金项目: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2015ZDZX23);教育部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17JDSZK054)

作者简介:刘富胜(1978—),男,重庆南川人,副教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然造成国内矛盾异常尖锐,致使无产阶级革命热情高涨。俄国正是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参与争夺世界市场的世界大战不仅没能扭转国家的危局,而且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俄国无产阶级抓住了机遇,完成了革命任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十月革命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蓝图变成了现实。

其次,十月革命改变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十月革命前,资本主义尽管遭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揭露和嘲讽,遭到了科学社会主义者的反思和批判,但多数落后国家的“先进分子”“仁人志士”依然把资本主义作为本国改良或革命的样板。资产阶级不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落后国家的大门,也用商品贸易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生产资料私有制视为是实现“天赋人权”的经济基础,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被包装为亘古以来最为合理的且符合人性需要的人际关系。

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采取了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用美国学者约翰·理德的话来讲“革命把俄国从底层翻腾出来。现在是底层人升跃到上层来了”^[4]。前苏联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之下,经过两个五年计划,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化强国;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抵御德国法西斯进攻的桥头堡。人们从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中领悟到,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维护民族尊严,才能加快现代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十月革命精神指引着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落后国家“民族解放”的行动,有的国家更是直接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但依然有部分国家坚信,十月革命已经指明了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纷纷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和难民危机之后,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尽管具有长期性,但这种趋势“不可逆转。”

最后,十月革命提升了人们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黑格尔在谈到历史发展与主观意愿的关系时,曾提出了“理性的狡计”。认为人只不过是实现“绝对精神”意志的工具,无论人们在现实生活表现得如何理性,最终实现的都是世界历史自在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人们的意图“大不相同”^[5]。在马克思看来,革命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产物,当新兴阶级的意愿难以实现,就会以“社会理性”代表的身份,带领人民群众推翻阻碍历史发展的没落阶级,历史总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列宁认为革命不仅客观环境逼迫的自发行为,同时也是面向未来的自觉造就。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片面依靠工人阶级的“自发意识”,应该发挥先锋队作用向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积极灌输”先进思想。“要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主义的枷锁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6]。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夺取政权,而且还要巩固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向未来的共产主义过渡,这就将无产阶级革命与人类解放、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结合起来。十月革命同时也激发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对“历史趋势”的理解。俄国十月革命后积极倡导新型国家关系,主张每个民族都有权参与对“人类命运”的决定,这就让落后国家看到了发展的希望。毛泽东认为,十月革命不仅在西方和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且为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

二、中国社会对十月革命的差异化解读

十月革命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引发了中国社会各界的“集体焦虑”,他们开始追问“俄国革命会不会在中国发生,俄国道路是否适合中国”^[7]。北洋政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各自立场出发,对十月革命进行了差异化解读,采取了迥然有别的态度。

一是北洋政府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排斥与误导。十月革命胜利后,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宣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同年12月发表了《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中,宣称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东方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俄国革命政府先后在1919年和1920年发表了对中国政府的宣言和外交照会,表明愿意主动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以及放弃沙俄在中国的利益和特权。北洋政府既没有十月革命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也没有正确认识到俄国新生政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平等待我”之政府。北洋政府采取了西方列强“保持一致”的立场,撤离公使、关闭边界,甚至配合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出兵西伯利亚。北洋政府将俄国革命党视为“洪水猛兽”“过激党”,企图隔绝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北洋政府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阻止俄国新生革命政府的相关信息进入中国,对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进步团体进行打压和取缔;另一方面恶意解读俄国新生革命政府对中国释放的善意,认为这只不过是“以欺骗的手段施诸中国,危险莫甚”^[8]。但是封锁、欺骗改变不了人们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先进制度的追求和向往。毛泽

东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十一月七日俄国发生革命,十一月八日中国就知道了”^[9]。

二是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的观望与徘徊。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作为被压迫的对象,他们希望通过革命结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作为剥削阶级,他们又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希望效仿欧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资产阶级对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欢呼雀跃,认为这是“世界之一大事件”,但是对十月革命则表现出惊恐不安、充满偏见。以《民国日报》1918年元旦的社论为例,其认为十月革命让俄国“重陷于无政府之状态”,俄国人民必然会遭遇“恐怖、悲哀、不安、激愤诸苦”。即便是资产阶级内部最进步的人士,也未能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孙中山先生从十月革命中首先想到的是“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则十二年尚未成功”,他将十月革命的成功归结为克伦斯基政府继续参加一战以及人民的普遍反战。他敬佩列宁等人的勇气和智慧,他看到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先进的组织能力,但是他并没有看到帝国主义薄弱链条上所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在给列宁的贺电中,孙中山指出“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10]。在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信中,孙中山提出“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指苏俄对党、军队、群众等进行宣传及训练而言)所能告诉我的一切”^[11]。资产阶级“重术不重道”,他们在十月革命之后依然徘徊不前,试图借助苏俄的帮助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想,却没能发现十月革命已经为中国开启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三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介绍与传播。“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2]。十月革命让部分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以俄为师”日益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中,追溯了十月革命的思想源头,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以“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13];十月革命与以往革命,尤其是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十月革命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劳工主义的胜利”。李大钊还认为十月革命“只可迎、不可拒”的世界潮流。陈独秀在《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俄国精神》《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等文章中指出,十月革命是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部分突破”,已经表明“世界大势”的变动,中国革命不可能再走别的道路,应该顺应十月革命的历史潮流。蔡和森认为,十月革命所开启的历史潮流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社会主义才是改造世界“对症之方”^[14]。十月革命后,部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开始重视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不仅通过创办刊物、开设夜校、参与工人运动等方式来积累经验,而且开始组织团体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15]

三、十月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初心建构的重要启示

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知识分子先后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辩”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论”。这些争论让更多的仁人志士对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动力和方式等等方面,“有了初步清醒的认识”^[16]。十月革命“为底层民众而奋斗”“为民族复兴奋斗”的精神和情怀,始终激励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们。学习和借鉴十月革命的宝贵经验、沿着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以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初心。

首先,十月革命激励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初心。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先后经历了“失梦”“迷梦”“寻梦”“追梦”的过程。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仅摧折了天朝上邦的自负,而且让人们错把资本主义的经济优势、技术优势、军事优势归结为制度优势,力图从西方列强和近邻日本那里寻找民族复兴的答案。一次又一次尝试,无不以希望开始、失望结束。缺乏对本国国情的清醒认识和革命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的准确分析,没有先进革命思想的指引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一厢情愿地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帮扶之上,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十月革命让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曙光”。他们坚定地认为,只要方向正确,俄国人能够做到的,中国人也一样能够做到。俄国与中国同为国土面积广袤的大国;俄国遭受其他资本主义的排挤,是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中国遭受西方列强赤裸裸的侵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俄国曾陷入帝国主义战争不能自拔,中国则始终没有走出内外交困之境地。十月革命让俄国摆脱了“帝国主义薄弱链条”的地位,坚决退出了“狗咬狗”战争;工农群众一跃成为

国家主人,积极捍卫新生革命政权,整个国家呈现出崭新气象。中国共产党的初创者们认识到,从底层劳苦大众的立场和需求出发,用先进思想武装底层民众,就一定能够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革命需要有阶级基础,要将“工农劳动人民”组织动员起来;革命要有领导力量,需要组建“坚固的精密的组织”^[17]。蔡和森直接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要让这个党成为中国革命的“发动者、宣传队、先锋队、作战部”,担负起“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和“民族革命的责任”。毛泽东认为蔡和森的主张“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8]。中国共产党的初创者们认识到,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宝贵经验,中国革命就一定能够成功,中华民族的近代颓势就一定可以扭转。

其次,十月革命启迪了中国共产党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初心。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不从实践出发,而是从理论出发,抓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只言片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康德主义式的错误解读。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不再是现实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仅仅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和慰藉工人阶级的道德鸡汤,革命没有方向目标,“运动就是一切”。列宁与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的态度不同,强调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精髓出发,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列宁进行了理论创新,提出了“帝国主义论”“一国革命论”,指明俄国工人阶级不能坐等时机,而是应该率先革命;列宁还进行了实践创新,根据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提出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尝试和探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19]。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从理论上讲并不困难;但面对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要在实践上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并非易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们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提出要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境”结合起来;恽代英也强调“国情”与“共产主义”的有机结合;张太雷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一定要考虑本国的“具体特点”。直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我们党才提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在系统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全党才形成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识。

再次,十月革命鼓舞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初心。革命力量总要经历由弱到强的过程,总要经受困难与挫折的考验。十月革命牢牢依靠工人、农民和士兵等底层民众,不仅推翻了资产阶

级政权,而且抵御了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极大地鼓舞了落后国家的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彻底摆脱被殖民地位,才能尽快实现国家现代化。

十月革命精神感召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针对本国实际提出了“两步走”的革命战略,即首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然后在此基础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以往革命的不同,就在于“我们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三大改造”后,我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随着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也越来越大。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以福山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更是直接宣称“历史的终结”,认为资本主义在于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大获全胜”,人类从此将摆脱“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20]。在俄国内部,否定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也一度成为潮流,十月革命被扭曲为“十月政变”、让俄国人“误入了歧途”^[21]。即便在这个时候,我们党的领导人也坚定地认为,十月革命开创的道路是正确的,只要善于从苏联解体中汲取教训,社会主义就能够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22]。我们今天坚持社会主义,就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相统一、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多种分配方式相统一;就是在政治上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就是在思想文化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相统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且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走出资本主义困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益借鉴。

最后,十月革命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初心。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指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人性危机”和“生态危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所有共产党人共同的理想信念。十月革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向实践飞跃的必要环节,是共产党人精神之钙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定了十月革命,必将危及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信,就会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只能停留在书斋里对资本主义进行貌似理性、实则无力的文字批判。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现实运动,就在于每时每刻对资本主义的实践超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信念,要求人们把个体的生命价值融入人类社会最伟大的事业之中。缺乏对共产主义的全面理解,就会产生“过时论”“渺茫论”等错误认知,就会出现“理想信念淡薄”“宗旨意识不强”等问题。部分人只顾自己利益,“一切向钱看”,忘记了党的宗旨和使命;部分人只谈发展建设、不谈理想目标,看不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迷失了方向。十月革命是检验人们是否具有理想信念的试金石,它曾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不顾千难万险推翻三座大山,并通过“三大改造”为社会主义奠定坚实基础;它也曾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它必继续激励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时不我待”的担当、“刮骨疗伤”的决心和“迎难而上”的勇气,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十月革命是俄国人民的大事件,也是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把自己的事业看做是十月革命的继续”^[23]。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行”。我们既不能忘记改革开放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初心;也不能忘记建国时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的初心,更不能忘记建党时继承和发扬十月革命精神、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初心。

参考文献：

[1] 章忠民,谭志坤. 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智慧与力量[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3):71-76.

[2] 汪青松.“不忘初心”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9):62-65.

[3] 米罗诺夫. 苏联解体的原因与后果[J]. 西伯利亚研究,2006(3):75-78.

[4] 里德. 震撼世界的十天[M]. 李娜,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2.

[5] 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95.

[6] 列宁.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6.

[7] 王雪楠. 从“俄乱”到“俄式革命”[J]. 中共党史研究,2014(12):51-58.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611.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90.

[10]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1:500.

[11]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1:593.

[1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70.

[13] 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43.

[14] 蔡和森. 蔡和森文集:上卷[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23.

[1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9.

[16] 孙建华.“问题与主义”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发[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5):148-151.

[17] 胡绳.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13.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90.

[19] 江泽民. 论党的建设[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10.

[20] 福山. 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的人[M]. 黄胜强,许铭原,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78.

[21] 吴恩远. 十月革命:必然性、历史意义和启迪[J]. 世界历史,1997(5):10-20.

[2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3.

[23] 周新城. 为什么要纪念十月革命[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4):52-59.

(责任编辑:许宇鹏)

